

611.27109

I210.97  
275

3

# 鲁迅作品辞典

审订 林志浩  
编者  
(依姓氏笔划排列)  
刘华山 张先筠  
罗炯光 施晋和



B

729562

## 鲁迅作品辞典

审 订 林志浩  
编 者 (依姓氏笔划排列)

刘华山 张生筠  
罗炯光 施晋和

责任编辑 胡 笏

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河南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20.75印张 708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346册

ISBN7-5347-0573-8 / I · 18

定价: 11.00 元

## 序

鲁迅是名副其实的民族魂。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的伟大不仅在于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成为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英勇战士，而且能够跟随时代前进，从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他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成了体现中华民族新文化正确方向的伟大代表。这些都是常识，并已为几十年的历史事实所反复证明，似无须多说；但也不能因其已被实践验证而不说。

鲁迅给祖国和人民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鲁迅作品，应该也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食粮。鲁迅虽已去世半个多世纪，他的文学遗产，包括小说、散文、杂文、书信及学术论著，并未随时光流逝而失去意义。不，时至今日，他的创作与精神，仍然充满活力，并未过时。鲁迅曾希望自己的文学“速朽”，期待攻击时弊的文字与被攻击的时弊一同灭亡、盼望祖国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仿佛能触摸到鲁迅那颗滚烫的爱国之心。鲁迅的心，与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进的中国人民的心是相通的，与当代青年的心是相通的。鲁迅是座巍峨的宝山，凡愿意学习并善于学习的人，拾级攀登，寻胜探宝，是不会无所收获、空手而归的。

适应学习鲁迅需要而编写的，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部《鲁迅作品辞典》，是国内全面阐释、注解鲁迅作品的第一部中型工具辞书。鲁迅著作数量浩繁，对于当代青年来说，比较艰深、难

读，钩玄提要，梳理注释，可省读者翻检之劳，大概不算节外生枝画蛇添足。它的出版，将帮助读者理解鲁迅作品，认识鲁迅的为文与为人。它的出版，对普及鲁迅著作、学习鲁迅精神将有所裨益，可以成为沟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所以我愿将它推荐给广大读者，特别是推荐给广大青年和语文工作者。自然，编写这样的辞书尚属草创，缺乏经验；限于编者水平，疏漏不当之处恐难避免。欢迎提出意见，以便再版时修正。

林志浩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日

## 前 言

《鲁迅作品辞典》是阅读鲁迅作品的工具书。以阐释、注解鲁迅作品（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为依据）为主要内容，以中学教师、各类大专学生及鲁迅作品爱好者为主要对象。

本词典共收词目2297条，分集名，篇目，人物形象，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社团、期刊、流派，词语、方言、译辞、掌故及附录（笔名、年谱、译著书目）八部分。集名部分集中介绍了鲁迅各集文章最初掲載报刊、出版时间，概括提示文章的时代背景，作者思想发展以及集名来源；篇目部分逐篇介绍了鲁迅作品的主题思想、主要内容及写作特点，其中不含《集外集》附录和《集外集拾遗》附录，另加入《译文序跋集》；人物形象部分集中简明地分析了鲁迅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及社会意义；历史人物部分无论古今中外均以与鲁迅有过往来，并对鲁迅思想发展产生过影响或发生过阻挠、或与之进行过斗争的为限；历史事件部分是以作品中所涉及的中外重要历史大事为主；词语、方言、译辞、掌故部分其目自明，大凡作品中为今人鲜知、或有碍阅读的难词均予以简单地注释。这些条目大多为编者自拟。

每类词条均按首字笔画由少到多排列；画数相间的，按笔形横（一）、竖（丨）、撇（丿）、点（丶）、折（乚）顺序排列；首、二、三字相同的，则从不同字开始，仍以先笔画、后笔顺为序排列，依此类推。为方便读者查阅，本词典后附音序索引。

正文之外，尚有附录三篇：鲁迅笔名、鲁迅年谱简编、鲁迅

译著简介。

《鲁迅作品辞典》由刘华山、张生筠、施晋和、罗炯光编写，“集名”、“篇目”部分由罗炯光执笔；“人物形象”部分由张生筠执笔；“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社团、期刊”部分由刘华山、施晋和执笔；“词语”部分由刘华山、张生筠执笔。

全书由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林志浩教授审订。

限于编写者的水平，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八年七月

---

## 总 目

|                       |              |
|-----------------------|--------------|
| 序 . . . . .           | ( 1 — 2 )    |
| 前言 . . . . .          | ( 1 — 2 )    |
| 目录 . . . . .          | ( 1 — 42 )   |
| 集名 . . . . .          | ( 1 — 46 )   |
| 篇目 . . . . .          | ( 47 — 266 ) |
| 人物形象 . . . . .        | ( 267—292 )  |
| 历史人物 . . . . .        | ( 293—406 )  |
| 历史事件 . . . . .        | ( 407—460 )  |
| 社团、期刊、流派 . . . . .    | ( 461—515 )  |
| 词语、方言、译辞、掌故 . . . . . | ( 516—548 )  |
| 附录 . . . . .          | ( 549—565 )  |
| 音序索引 . . . . .        | ( 566—614 )  |

# 集 名



## 二 画

《二心集》 收一九三〇和一九三一年所作杂文三十七篇，末附《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文一篇。原发表于《萌芽月刊》、《文学导报》、《文艺新闻》、《十字街头》、《中学生》、《前哨》、《文学月报》。后编入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第四卷。

《二心集》深深刻印着时代的投影。这个时期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空前尖锐而复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革命文学进行文化围剿，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也伸出了侵略魔爪，在文化领域，蚊蝇成阵，沉滓泛起。这一时期，鲁迅本人也遭到更多的攻击与诬陷，但他并未沉默，而是一如既往，举起了投枪。

本集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总结革命文学运动的经验，批评左翼文艺阵营内部的左倾幼稚病，如《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上海文艺之一瞥》、《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等。

继续批判“新月”派胡适、梁实秋等人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与反动倾向，如《“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知难行难》等。

愤怒声讨与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革命作家的法西斯暴行，揭露

“民族主义文学”的反动本质，如《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文艺界的现状》、《“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等。

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痛斥国民党政府的卖国罪行，剖析“国难声中”“沉滓的泛起”，如《答文艺新闻社问》、《“友邦惊诧”论》、《以脚报国》、《宣传与做戏》等。

《序言》（写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揭露国民党对进步刊物“逐日加紧的压迫”，对于被讥笑为“投降”“二臣”之说，鲁迅觉得“很有些意思”，“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表示自己乐于背叛出身的阶级，坚决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但鲁迅决不自称为无产者，敢于承认还残存着“中产的智识分子的坏脾气。”他旗帜鲜明地宣称：“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坚定立场。

《二心集》是鲁迅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进入成熟时期的作品，在鲁迅杂文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后来说：“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

## 三 画

《三闲集》 收一九二七年

至一九二九年所作杂文三十四篇，末附作于一九三二年的《鲁迅译著书目》一篇。分别作于广州、上海。原发表于《语丝》、《未名》、《莽原》、《萌芽月刊》、汉口《中央日报》副刊等报刊。一九三二年九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后编入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第四卷。

鲁迅自述：“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以及与此有关的文字，成为《三闲集》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文学的阶级性》、《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等篇，表达了鲁迅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系列问题的重要看法。鲁迅是赞成并肯定革命文学的，但是他不满意只挂招牌，不敢正视目前的暴力与黑暗，而自欺欺人地称为“超时代”等现象。他认为和用自己的手提着耳朵不能离开地球一样，作家也不能离开现实，说“超时代”其实是逃避。他反对忽视文艺的特征，片面强调文艺的宣传作用的观点。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革命之所以……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关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的观点是：“都带”，而非“只有”。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在这之前、之后，他曾反复申述过

这种看法。但是他不同意把文学的阶级性绝对化，反对“竭力增强阶级性说”，承认文学中自有不带阶级性的因素、承认文学的社会性等说法。鲁迅十分重视作家的改造，并且认为这是艰难严肃的事情，反对与此不相称的态度与作风，批评有的人脑子里存着许多旧残滓不肯认账，反而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鲁迅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本集中的文章正是鲁迅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文学问题的最初成果，对已露端倪的左倾思想，表现了持异态度，批评它脱离了中国现实。

鲁迅还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形势、解剖民情、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在《铲共大观》《太平歌诀》等文章中，鲁迅对部分市民群众的麻木愚蒙十分痛心。然而某些革命文学家竟视而不见，欢迎喜鹊，憎恶枭鸣，他对这种态度感到难于理解：不是正因为黑暗，才要革命的么？鲁迅总结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革命被杀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

在文艺批评中也表现出鲁迅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知灼见：他实事求是地指出缺点，恰如其分地评价作品（参见《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

引》与《柔石作〈二月〉小引》)。

《三闲集·序言》(写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着重说明自己从“四一二”到革命文学论争中轰毁进化论思想、逐渐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过程：“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但“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

关于书名的由来，鲁迅说：“我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所集的材料，印为《小说旧闻钞》，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却是至今还不能完全忘却的。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 四 画

《中国小说史略》 本书原为作者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后经修订增补，先后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九二四年六月，由北京大学新潮社以《中国小说史略》为题分上下册出版。一九二五年九月合印一册，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一九三〇年经作者修改，于一九三一年出版修订本。一九三五年第十版时又作个别改订，以后各版均与第十版同。后编入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第九卷。

《中国小说史略》是我国第一

部系统论述两千余年小说发展历史的专著。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评介了各个历史时期主要的小说作家和作品，最早概括了小说从产生到成熟的演变过程，勾画出我国小说发展的基本轮廓，探索了小说的发展原因，初步揭示了小说发展的规律性。

“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史略》“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描绘出中国小说由上古的神话传说、鬼神志怪，到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的演变过程，为我们提供了脉络清晰的我国小说“进行的线索”。

这部专著共二十八篇，第一篇为“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属于绪论性质，第二篇“神话与传说”，认为神话是小说的萌芽与渊源，还分析了神话向传说的演变。第三篇到第七篇，叙述汉到元朝的小说，为小说的最初阶段：即短篇小说的雏型。从流传于口头以及散见于经、史、子中间的神话传说，演变为独立成篇的短篇小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汉书·艺文志》所载许多小说的目录，大都散佚；现存所谓汉人小说，经鲁迅考订，全系后人伪作。只是到了魏晋南北朝，短篇小说才开始大量出现。《史略》把六朝的小说分为“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志怪”，与记人间事的“志人”。这两类小说虽然都还不是自觉创作，但从它“委曲详尽”的叙述，已可看出从古代神

话传说向小说创作的过渡，记录东汉末年到东晋清谈家言行的《世说新语》更能寥寥数语使人物跃然纸上，成为我国小说的先驱。唐代是我国小说成型成熟的阶段。《史略》第八篇至第十篇叙唐之传奇与杂俎。鲁迅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有意为小说”。小说到唐代，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作家也自觉到这是一种创作，开始大胆想象虚构，艺术技巧也更趋熟练，情节更为曲折，刻画更显细致，人物形象比较丰满，题材也由神怪转向现实。总之，作品内容与艺术形式，创作思想与创作方法与魏晋小说相比，都有质的飞跃。陈鸿的《长恨歌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都绝非魏晋小说可比，唐代传奇对后来的小说，特别是对戏曲有着深远的影响。第十一篇至十三篇叙宋之志怪、传奇、话本，拟话本。到宋代，志怪与传奇渐趋没落，仅剩余波。“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是也”。唐代传奇主要是上层文人士大夫的创作，宋代话本是“平民底文学”，是下层知识分子和民间艺人的创作。平话的题材更为广阔，使小说从“搜奇记逸”发展为现实

生活的直接描绘，与内容的变革相适应，体裁、语言、章法也有很大改革，“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由传奇到话本，其意义甚至超过了从志怪到传奇。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市民经济繁荣，“说话”在宋代大为盛行。据宋人记载，当时“说话”有四科，其中“讲史”与“小说”与后来小说的发展关系巨大，“讲史”中的“说三分”，到明代便发展为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所谓“话本”，就是艺人“说话”的底本，如《京本通俗小说》。《史略》第十四篇至二十一篇所述我国小说到明朝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元末明初出现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长篇章回小说，明中叶以后，更多的长篇和短篇小说问世，如《西游记》、《金瓶梅》、“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拍案惊奇》初刻、二刻）。明代小说较过去，题材更广阔，人物更丰满，性格更鲜明，情节更曲折，优秀长篇小说的涌现更标志着我国小说日趋成熟。《史略》把明代小说分为讲史、神魔、人情和拟宋市人小说，分别加以论述。《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与宋元“说话”关系密切。除《西游记》外，鲁迅把《封神传》、《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也列入“神魔小说”。明中叶后，“记人事者亦突起”，其代表作为《金瓶梅》。清代是我国小说进一步繁

荣时期，《史略》最后七篇（从第二十二篇到第二十八篇）分别论述拟晋唐小说、讽刺小说、人情小说、见才学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及公案小说、谴责小说等七种体式。其主潮为人情小说。对《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优秀作品给予高度评价。

《史略》把小说及其发展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进行考察，注意从社会历史方面说明小说演变发展的原因，分析政治、宗教、社会风气、文化传统对小说的影响。如谈魏晋志怪小说，就联系“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以及佛教传入我国去说明。而谈玄说道之风，则使记载奇行隽语的“志人”小说应运而生。除了重视小说发展的外部原因，《史略》还注意对其内部原因的探究。结合分析清代《儒林外史》，鲁迅还考察了中国小说讽刺艺术的源流及演变：“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然此类小说，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情”，甚至“私怀怨毒，乃逞恶言”。《史略》认为没有上述正反面的艺术经验，《儒林外史》也难于产生。

《史略》对历史上许多重要作品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充分表现了鲁迅作为卓越小说史家的胆识与见地。如评论《金瓶梅》，不忽略它的“猥词”，又看到它的“佳处”，指出该作“描摹世态”，

“诚极洞达”，“同时说部，无以上之”，从小说史的角度肯定了它的历史地位。历史的观点和比较的方法，不是分离而是统一的，《史略》对《封神传》的评述就运用了这种科学方法。《封神传》作者，意欲与《西游记》、《水浒传》鼎立而三。鲁迅从比较中说明其优劣和地位。从演史看，《封神传》“侈谈神怪，什九虚造”，缺乏《水浒》那样充实牢固的生活基础；从幻想看，比较拘束，不如《西游记》那样雄浑恣肆，因此“迄今未有以鼎足视之者”。结论来源于历史的比较，因而显得妥贴沉稳。

《序言》（写于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指出：“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并说“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

《题记》（作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指出《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研治之风，颇盖盛大，显幽烛隐，时亦有闻”，“此种要略，早成陈言”，鲁迅并没把自己的著作看成十全十美，恰恰相反，他因“别无新意”，不能重新改写而慨叹不已：“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他热望后来者超过它。

《后记》（写于一九二四年三月三日）略述上册印行及下册撰稿的经过与情况。

《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了高度重视。郑振铎指

出：“这是一部奠基的大著作”。

“近三十年来研究中国古小说的人很多，但象鲁迅先生那样气吞金牛，一举而奠定了研究的总方向，有了那末伟大而正确的指示的，还不曾有过第二人。”《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一九四九年十月《人民文学》创刊号）日本学者增田涉也指出：“鲁迅的名字成为难忘的东西渗进我的头脑的，倒是由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材料的丰富和体系的完整使人惊异。”

“我深感到《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小说史的划时代名著。”（《鲁迅的印象·绪言》）

**附录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本篇系作者一九二四年七月在西安讲学时的记录稿，经本人修订后，收入西北大学出版部一九二五年三月印行的《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一九八一年作为《中国小说史略》的“附录”，编入新版《鲁迅全集》第九卷。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除“前言”外共有六讲，二万余字（约为《中国小说史略》篇幅的五分之一）。《变迁》是《史略》精华的缩编。不仅如此，它还补充了前书未曾论及的理论和例证，修正了前书的某些说法，因此，可以说它还是《史略》的丰富与发展。既可看作是《史略》的补充与附录，又可如实地当作一部独立的著作，它的价值不是《史略》可以完全替代

的。

“前言”指出：中国历史的进化途中“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孱杂”。步子艰难而缓慢，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中国小说发展的特征。

六讲的题目是：

- 一、从神话到神仙传
- 二、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
- 三、唐之传奇文
- 四、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
- 五、明小说之两大主潮
- 六、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

第一讲论述小说的起源，比《史略》大有发展。鲁迅说：“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小说是“从休息时发生的。”

其他五讲按五个主要历史时期和朝代，突出该期小说的主要样式、特征，有纵的发展，也有横的联系，使听众在较短时间里，对中国小说前进的轨迹得一明晰的了解。

对元稹的《莺莺传》及其续作，《史略》叙述很详，《变迁》补充了一段论述“续作”把张生和

莺莺写成终于团圆的原因的文字：“因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大概人生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欺骗。”批判“团圆主义”，在《史略》就有了，如批评高鹗的《红楼梦》后四十回，《变迁》加强了对“大团圆”的批判。第四讲中，鲁迅把《史略》批评《三国志演义》人物描写上的缺点，更加具体化了：“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鲁迅把这些缺点概括为“描写过实”，意思是说这样违背生活真实，走极端，绝对化。他反对这样做，而坚持按生活实际来写人；要真人，不要假人。

《变迁》对《红楼梦》的评价也丰富和发展了《史略》的说法，其精神与上述对《三国志演义》的意见一脉相通：“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

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高度估价《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成就，既反对“溢美”，也不同意“溢恶”，这些意见对我们成功塑造艺术形象，都是颇有助益的。

另外，《变迁》因为是讲课的记录，还有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特点，这些也是区别于《史略》的。

《日记》收入作者自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至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所写的日记。作者生前未发表过。一九五一年四月上海出版公司曾据手稿出版影印本，其中一九二二年部分因手稿失落付阙。一九五九年、一九七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两次出版排印本，并据许寿裳所录存的片断补入一九二二年部分。一九八一年《日记》作为十四、十五卷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新版《鲁迅全集》。

早在南京求学前后，鲁迅就已经开始写日记，周作人在自己的文章中曾引述过鲁迅早期的日记。可惜失落多年，毫无踪迹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侵略军逮捕了许广平，鲁迅日记被全部搜去，发还时缺了一九二二年的一本，成为永

远无法弥补的损失。这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债。

对于自己的日记，鲁迅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中曾有过说明：“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为了不牵连友人，有关政治的人物，和很熟的人，与他通信或见面，倒不一定写在日记里。“银钱收付”，付出的不一定记载，但收入及别人归还的，就不肯遗漏。许广平指出：“他的日记写的大约是不大不小的事。太大了，太有关系了，不愿意写出；太小了，没什么关系了，也不愿意写出。其间写作的大部生活，整天的忙碌非常，也不过在工作的某时期偶然说起就是了。”（《欣慰的纪念·鲁迅先生的日记》）

《日记》是鲁迅一生战斗生活的记录，它简要而真实地反映了鲁迅的革命业绩和思想发展历程，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使我们直接看到鲁迅是怎样生活、工作和战斗的。

《日记》是研究鲁迅生平史实的重要依据。它真实记录了从三十一岁到逝世前的鲁迅生活、居住、行止、婚姻、家庭等重要史实，想要了解和认识鲁迅而不读《日记》，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鲁迅与许广平第一次来往信件（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他们同船离广州赴上海、

开始同居生活（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八日），《日记》中均有记录。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日记载：“晨八时广平生一男”，第二天日记有“买文竹一盆，赠广平”，当然是恭贺得子、表示慰问之意。鲁迅在北京十四年，前七年（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单身住在绍兴县馆，一九一九年末将母亲与朱安接至北京后，原与周作人一家合住八道湾十一号，后兄弟失和，鲁迅曾在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暂住，最后迁居于阜成门西三条二十一号，《日记》记载详明。定居上海后，一九二九年五月和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鲁迅两次到北京探亲，《日记》写得清楚。《日记》还记录了一九三〇年春和一九三一年初离开寓所出外避难的情况，透露了当时社会黑暗的信息。鲁迅晚年，《日记》有不少关于病情的记录：“发热”、“胃痛”、“气喘”，八月一日载：体重“八五·八磅”，但三至五日还写完了长篇论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确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鲁迅《日记》大量记载了他与友朋的交往与信函。许寿裳先生是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时的同学，后来又长期共同就职于教育部，他们友爱如兄弟，《日记》提到许先生的有八百六十处之多。要了解鲁迅与许先生的关系，《日记》是极重要的材料。除许寿裳外，教育部同事中鲁迅与齐寿山的关系也较密